

的旧观念不再被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于是,派遣学生出国,直接到西方各国“师其长技”,作为改革传统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会一帆风顺吗?

一、容闳与幼童留美

容闳(1828—1912),号纯甫,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人(今珠海市南屏镇人)。1841—1846年,容闳在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学习。这所以著名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名字命名的教会学校以促成或改善中国教育为宗旨,在这里,容闳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47年1月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回国,愿意携带数名中国学生随他一起赴美继续深造。在教会和香港英商的资助下,容闳和同班同学黄宽、黄胜一同随布朗先生赴美留学,成了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三人到美国后,先到马萨诸塞州一所叫孟松学校的高级中学学习。一年后,黄胜因水土不服,经常生病,不得不中断学业,提前回国,回国后的黄胜后来接替林乐知做了几年上海同文馆的总教习;两年后,黄宽完成了预定学业,后转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而容闳则在美国佐治亚州一妇女会的资助下,考取了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大学四年,容闳克服重重困难,依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习和生活费用,终于于1854年毕业,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接受系统高等教育的中国人。

1855年,踌躇满志的容闳带着满脑子的想法回国。此时,清王朝风雨飘摇,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取得了半壁江山。容闳对这个新政权一知半解有些好感。1860年容闳满怀信心地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号称具有先进思想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来七条改良社会的建议,其中四条与教育相关:设立武备学堂、建立海军学校、颁定各种学校教育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洪仁玕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对其改良社会的建议不予实施。

1867年12月,容闳又在苏州拜见革新派大将江苏巡抚丁日昌,向丁日昌提出改造社会的教育计划,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容闳道: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位十五年。学生年龄

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二批学生出洋留学卓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①

容闳的计划得到了丁日昌的认可,丁日昌将容闳所撰的“条陈四则”转交军机大臣文祥代奏。后因各种原因,容闳的建议被搁浅,但却得到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1871年8月16日,曾国藩、李鸿章两大重臣联名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建议:“拟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訢认为曾、李所奏可行,奉旨“依议”。为了顺利实施这一计划,1871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了出洋肄业局,为预备赴美的学生教授基础英语。容闳则先行赴美,在马萨诸塞州水泉镇附近为学生安排住宿并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设立总部。

一切似乎挺顺利,可像京师同文馆的遭遇一样,招生出了问题。由于当时整个社会仍然将通过科举入仕做官视为“正途”,把孩子弄到洋人的地方去,那还不等于流放?即便是通商口岸相对开通的地方,也觉得这种做法比送孩子上同文馆要冒更大的风险,这风险主要来自于社会的鄙视。偌大一个中国容闳花几个月时间竟然找不到30名预备留学生。容闳在自己的老家,挨个敲适龄幼童家的门,鞠躬作揖,磨破嘴皮,一些家长基于对他家族和他个人的信任,愿意他带孩子们出去。今天我们看第一批中国留美幼童中有太多广东籍和香山籍贯的孩子,以为是容闳在徇私照顾自己的老乡,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尽管老乡们给他面子,但还是没有凑够数,他只得跑到香港,在英国政府所设学校中,挑选了几个聪颖而且对中西文化有根基的学生,才算凑够了数。

1872年2月27日,李鸿章、曾国藩再次联袂上书,对原定的留学计划做了详尽的补充,并奏请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理一切事宜。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中国幼童30名,在留学监督陈兰彬、留学副监督容闳和汉文教习叶绪东、翻译曾兰生的带领下,乘船驶向大西洋彼岸。1873年

^①容闳著,文明国编:《容闳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

6月12日,第二批幼童30人由黄平甫带领赴美。1874年11月17日,第三批幼童30人由祁照熙带领赴美。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幼童30人,由祁照熙带领赴美。四批幼童共计120人,这是中国第一次成规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到美国后,这些幼童按两三人一组的方式分住在当地居民的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强化训练后,进入当地的小学学习,毕业后,陆续考入中学和大学。

由于幼童年幼,他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很快融入当地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很快“西化”。他们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不少幼童甚至剪掉了辫子,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信奉了基督教,诵圣经,做礼拜,十分虔诚。几个极端分子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些都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

幼童“西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引起了清政府留学监督陈兰彬的不安和不满,他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措施,但毫无效果。陈兰彬与容闳之间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没完没了的争吵。陈兰彬告容闳状的奏折一个个从美国飞到了北京。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1875年,陈兰彬奉命赴古巴,不能兼顾留学生管理,清政府于5月份调派欧谔良前往美国任代理留学监督,容闳继续做他的副监督,此时清政府对容闳的信任已极其有限。1878年冬,欧谔良调回工部任职。在陈兰彬的推荐下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是留学计划的反对派,他一上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完全不能容忍,他上任不久,就下令开除两名信教者,并勒令二人回国。吴子登还增加幼童们的中文课程,强化封建道德礼仪教育,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贷,甚至杖责。这些措施反而激起幼童们的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的。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他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讲容闳放纵幼童,目空一切。而容闳虽精明干练,但并不了解中国官场。支持他的曾国藩虽然去世了,但曾国藩的盟友李鸿章起初对他还是非常支持的,可他带学生到美国后,连一封信都没有给李大人写过。这样一来,吴子登的声音就成了朝廷决策留美幼童事宜的唯一参考。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从1881年8月21日起,所有幼童分三

批,启程回国。

幼童被撤回使前面的努力化为泡影。再过四五年,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给他们分配了工作。

虽然这些被“异化”的问题少年被以半成品的状态强制回国。然而,这些人毕竟在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加上他们个人的努力,几乎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蔡绍基,1859年生,广东省香山县人。归国后曾任清政府驻朝鲜外交代表袁世凯的幕僚、天津外事局局长、北洋大学校长、天津海关道台。

梁敦彦,1858年生,广东省顺德县人。光绪四年(1878)入耶鲁大学,归国后为张之洞幕僚。后历任汉阳海关道台、天津海关道台、交通银行董事长等职。

詹天佑,1861年生,广东南海县人,回国后到福建船政学堂继续学习,毕业后任广州黄埔水师学堂教习。他是京张铁路的主持者,粤汉铁路总工程师,清政府所有铁路线的顾问工程师。

唐国安,1858年生,广东省香山县人。曾参与修建京沈铁路,筹建并主持清华学堂的工作。

蔡廷干,1861年生,广东省香山县人,甲午战争中指挥威海卫鱼雷艇队,后任袁世凯总统的随从参谋,北洋政府北京海关总办。

吴应科,1860年生,广东省新会人,参加甲午战争,后任北京电报局总办、江南船舶修造厂总办、黎元洪总统的顾问、巡洋舰队司令、海军副司令。

唐绍仪,1861年生,广东省香山县人。曾任清政府驻朝鲜全权代表,袁世凯的秘书、天津海关道台、驻西藏代表、奉天巡抚。

容耀垣,1865年生,广东省香山县人。归国后分往天津水师学堂,后任孙中山总统顾问。

吴敬荣,1864年生,安徽庐江人。曾参加甲午战争,任广甲舰舰长。

徐振鹏,1864年生,广东省香山,曾参加甲午战争。后任北洋政府长江舰队司令、海军部次长。死于北京。

据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

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① 总之,他们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

二、公派留欧的尝试

前已叙说,1849年黄宽毕业于孟松学校后,转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黄宽可说是近代留欧第一人。10年之后,秀才出身的王韬又随同传教士理雅各前往英国,在英国生活学习了两年多,回国以后,成为变法图强的先驱者。1872年广东南海的青年何启自费留学英国,最初就读于帕尔玛学校,1875年进阿伯丁大学学医,1879年转入林肯法律学院学法律,后取得英国高级律师证书。1874年又有一位广东青年伍廷芳赴英留学,入林肯法律学院学习法律,毕业后,在香港任律师。但他后来从政,入了李鸿章的幕府,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武昌起义后赞成共和,出任南方各省军政府全权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北洋时期曾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代总理。护法战争中又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部长等职。

1872年,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楨由左宗棠保荐担任福建船政大臣。受幼童留美的启发,沈葆楨产生了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洋的设想,但因经费筹措困难未果。

1873年,沈葆楨再上《奏请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造船驶船折》,正式奏请派员出洋留学。他向朝廷建议:从福州船政学堂习法语的前学堂和习英语的后学堂中选拔学生赴法、英两国学习造船和驾驶。沈葆楨的建议得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赞同,但因相继发生了日军侵台事件和马嘉理案,故留学欧洲之事搁浅。

1875年,沈葆楨借福建船政学堂正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回国之便,在福建船

^①参见朱成良编著:《筚路蓝缕启山林:中外著名教育家业绩及思想述评》,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